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〇五）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七一期 ——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12d)

【往事回首】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	陈虹
【本刊专稿】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	余汝信
【当事者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侧记	曾庆祥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回首】

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

• 陈虹 •

一、小引

文革中，许多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英勇斗争、功勋卓著的优秀儿女，被“革命”“吃掉”，或者被“咬”伤。1965年冬，所谓“罗瑞卿问题”，就是事例之一。

十多年前，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当年亲身参加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的杨成武将军，探讨过发生这种斗争的缘由。罗瑞卿大将早已故去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杨成武将军也已西去了。这位文武双全的战将，也曾被“革命”重重“咬”伤。近日我翻阅那时向他请教这些问题的谈话记录，将这些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

二、从看望刘亚楼司令员说起

“您能否谈谈中央上海会议的缘由？”笔者先向杨成武将军提了这个问题。

“你说的中央上海会议，是指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的揭发罗瑞卿问题

的会议吗？”杨将军反问了一句。

“是的。”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杨成武想了想，平静地说：“要谈这个问题，我还得从那年春天说起。”

1965年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那时病情已经很严重。2月底，罗瑞卿总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自然，罗瑞卿与刘亚楼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他们个人之间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1929年刘亚楼由福建老家参加红军，不久就编到红四军，罗瑞卿在四军任支队政治委员。有次刘亚楼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儿子，不巧，刘带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临回家时，罗瑞卿给了他父亲一些银元，让他回家度日。解放后刘亚楼的父亲来北京探望儿子，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烟火，老人问刘亚楼当年给他银元的高个子首长在哪里？由此刘亚楼对罗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

正因为友情很深，所以尽管罗瑞卿对林彪的安排感到有点不合常理，但他还是先去看了刘亚楼，并安慰他好好养病。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罗瑞卿当时对刘亚楼传给他的这个信息，并没有立刻领悟到林彪在背后的用心所在，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脑子里认真地去思考。所以当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

林彪见此情景，意识到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随即转了话题，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

到了夏天，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报病危，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约我们夫妇二人一起去上海看望刘司令。我和刘亚楼的友情也是很深的，我们不仅是福建同乡，而且刘亚楼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我党“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结婚，生了一个男孩，回国后，他们离婚，刘和翟月英恋爱时，怕翟知道他有一男孩，就将儿子托给我，由我帮他照看，直至后来送八一小学读书。所以当罗瑞卿提出一同去看刘亚楼时，我们是很乐意的。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南楼。

3日下午，我们两家一起去看刘亚楼，那时，刘已经神志不清醒，是医生打了一针，使刘恢复了意识的。我们在病房里看到他不久即要离开人世的痛苦状况，除了告诉刘亚楼我们特地由北京来看望他了，就是尽量避免消耗他的精力，少和他说话，让他休息，以便延长一点生命。因此，大家都心情沉重地在那里默默地坐了很久。

晚上，罗瑞卿约我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他对我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

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 he 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

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听罗瑞卿讲完后，我琢磨着林彪的那些话，感到对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有分量的。罗瑞卿的心情也是很沉重的。于是就主动分担罗的责任，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并且提出了改正方法。他对我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5月4日上午，我们四人又一次去医院看望刘亚楼，这时刘已昏迷不醒，脸如黄蜡，医生正在忙于抢救，我们等了一些时候，见刘亚楼尚未清醒过来，想和他再说一句话已感到无望，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回住地去了。

当晚，罗瑞卿对我说：“明天我们回京。”

5月5日，我们决定回北京。我向罗瑞卿建议：“在离沪前是否去林总那里看一看。”

罗瑞卿因为刚挨了林彪的批评，有点情绪，不大愿意去。我向他说：“正因为林总发过脾气，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则他又抓住把柄，批评我们总参不辞而别，更被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总希望能和缓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

罗瑞卿听后，想了想，说：“那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我答。

随即商定两位女同志由锦江饭店直接去机场，我和罗瑞卿同车去林彪那里。一进林彪住的房子，就见吴法宪独自在那里坐着。吴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

林彪见罗瑞卿到了，马上拉他到另一个房子里，独自谈了三四十分钟，说了什么，罗瑞卿始终没有告诉我。我们出门时，吴法宪仍留在那里。

罗瑞卿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回到北京。

上班不久，我向总参有关单位，特别是作战部、政治部的领导同志打了招呼，要他们以后所有文件都送林彪一份，看不看是他的事，但我们一定要送。

6月中旬我在去西北一零二基地看地形的路上，老毛病交感神经失调和迷走神经亢进复发

了。罗瑞卿批准我7月回来去青岛休假。在那里，住了3个月，因病不断复发，决定转杭州疗养。9月29日，我和萧华同乘一架飞机抵达上海。我准备30日去杭州，萧华拟在上海过国庆节。

我到上海得知林彪住在那里，鉴于5月罗瑞卿挨批评的教训，不看他，怕说我失礼，所以晚上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说：“第二天早晨要离沪，想晚上去看望一下林总。”

“可以去。”半夜12点多，林彪住处回了电话。我和赵志珍立即赶到那里，但没有见到林彪，说他已经睡了，只看到了叶群和秘书郭连凯。我们在那里闲聊了一阵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按原定计划，一早我就飞往了杭州。

三、毛主席要我去他汪庄住地

在杭州，我住在空军疗养院。

10月底或是11月初，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我去一下，并派车来接我。不久浙江省公安厅王芳来车将我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我在总参工作已有多多年，毛主席接见外宾或开会时也见过多次，单独找我谈话问情况也有的，但这次毛主席要我去做什么？谈工作？自己养病已4个多月没有上班，手头也没有什么现成资料。而徐秘书在电话里又只字未提，因而想作点准备也无法去做。然而既是毛主席要我去，准是有重要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事情？想来想去，也拿不准。因此自己抱着毛主席叫办的事一定认真去落实，问什么，就我知道的如实回答的态度，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住在一幢古朴典雅很幽静的房子里，我到那里，徐秘书让我先在客厅里坐着，然后他去报告毛主席。

毛主席一走出来，我赶紧站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并说：“主席，您好！”

“好，好。”毛主席一面笑着说，一面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着：“坐下，坐下。”

毛主席走到我的对面，在一个大沙发上坐下，中间放着一个圆茶几。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清茶，一杯送到毛主席面前，一杯放在我面前。毛主席点燃一支烟，他一面吸烟，喝茶，一面同我像聊天似的说话。这时使我心情平静了许多，来时脑子里想这想那的猜测，顿时消散了。

毛主席亲切地问我到总参工作几年了，情况怎样？军队的情况怎样？我扼要地作了回答。毛主席又问：“各位老师怎样？”

“老师都有分工，刘伯承元帅负责军委战略小组，我协助他，贺龙主管航空和常规武器的研制，聂帅管尖端技术，徐向前任民兵组长，叶剑英抓训练。林彪由于身体不好，在北京时间很少，大部分住在外地，上海、苏州等处。军委的日常工作，根据您的指示，由贺老总和聂帅主持。”我如实向毛泽东作了回答。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换了个话题。

“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我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我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我谈的那些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我即回疗养院。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为揭发和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做准备。

四、毛主席鼓励罗瑞卿去看林彪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是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用8个月时间写成的，上海市委组织有关人员讨论过多次，讨论时据说关锋、戚本禹等也到了。文章发表后，上海各种报纸都刊登《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的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在上海，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他对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主席还交代：“对什么人都不要讲”。

11月25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

2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

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代表军委的喉舌。这篇编者按语，将《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并提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好好想一想，议一议”，这种很有分量，很有高度，把事态说得很严重的导向性按语，对于并不了解真情又忠于党的军队广大指战员来说，所起的号召和鼓动作用，其效果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北京日报》同日也转载了姚文，并写了一篇按语。按语把问题限制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的范围之内，压根儿就没有提到什么“阶级斗争反映”的问题。

11月28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

罗瑞卿离开上海后4天，即12月2日，毛泽东就在兰州军区52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短短的49个字的批示，就使罗瑞卿在党和国家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跌落下来，并由此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难。这确是关键的一击。尽管他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经历过数以百计的战斗锻炼，还是经受不住这49个字袭击！

五、出席上海中央会议

12月6日深夜。我的秘书朱欣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由上海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

那里有事，让杨副总长快去，要一定在第二天早晨7时以前赶到上海，交通工具自己解决。”朱秘书接完电话随即报告了我。

什么事那么急？是东南沿海有什么军事行动？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武装侦察？我心里顿时产生种种疑问。

“交通工具怎么解决？”朱秘书问。

“坐火车去来得及来不及？”我反问了一句。

“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到上海的车次。”

“坐汽车怎么样？”

“时间更长，不能按时赶到。”

“有飞机没有？”

“我去联系。”朱秘书了解后告诉我：“南京空军有一架犁二飞机空着。”

“你通知南空派一架犁二飞机来杭州。”我向朱秘书交代。

7日早上我们乘南空的专机准时赶到上海，在虹桥机场着落。走下悬梯时，徐业夫已站在那里等我。他一见到我就说：“主席要召开一个会，请你参加，你就住在锦江饭店。”是什么会？研究什么问题？徐业夫一个字都没有吐露。

当时毛主席住在虹桥宾馆。我进去一看，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叶剑英、谢富治等人已在那里了。住进饭店后，见到几位老同志，他们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贺龙来上海时，带来了地图，可见他原以为讨论的也是军事问题。这和我来前的想法有共同之点。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就当时参加的人来说，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同志，也有在中央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如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所以这次会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像军委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同志也没有明确宣布会议的名称，但就会议内容讲，就是揭发所谓罗瑞卿的问题。因此，我们姑且称这为中央上海会议。理由很简单：地点在上海，召集的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现在也有人称为“上海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的。

会议在1965年12月8日举行。会议分为三个小组，我们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和我。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

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雷英夫也揭发了所谓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我听了之后，脑子里产生另一种怎么也弄不通的想法：说罗瑞卿反对林彪，这怎么可能呢？从历史上看，罗瑞卿与林彪在红四军，红一军团，以后长征到陕北，进“抗大”都是在一起的。林彪虽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但“抗大”的具体组织工作，都是任教育长的罗瑞卿干的，林彪不管多少事。1959年彭德怀被打下台，将黄克诚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林彪当了国防部长，提名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工作是协调的，配合是默契的。

罗瑞卿在1965年下半年总参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到他和林彪的关系时，对我们说过：“我跟林总是跟定了，弹打不飞，棒打不散，骨头烧成灰也忠于林总的。”然而会议上确是揭发罗瑞卿所谓反对林彪的。

还有，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事实果真是那样吗？

1965年林彪对军队工作的《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指示，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总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和叶群在广州军区127师调查后向林彪汇报时说的，但形成正式文字，却是罗瑞卿亲自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主持讨论修改了七八遍才定稿，并送林彪审定后签发的。

总参谋部机关1965年7月召开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座谈会，就是罗瑞卿要我为进一步落实林彪的指示而举行的。

如果他真的反对突出政治，在行动上能有这么认真并用那么大的精力去抓落实吗？！

至于说刘亚楼讲的四条，我5月份在医院见到他时，刘已不省人事，是医生打了一针才苏醒过来的，根本没有谈此事。二三月份我在华东看地形，路过上海，去医院看望刘亚楼，同去的有王尚荣，在场的有翟月英以及医生护士，刘也根本没有提到这四条。

所以我对叶群的所谓揭发，既不敢苟同，又无法否定，只是听着。还有小组里的雷英夫当时揭发罗瑞卿是很积极的，他凭什么资格出席这样的会议，我很纳闷。因为作战部已有一个部长王尚荣出席，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副部长来参加呢？而总参其他业务部，又没有一个人出席这个会。这样的情况，也使人感到内中必有蹊跷。后来的事实表明，雷英夫确是投靠林彪，为打击罗瑞卿出了大力的。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找我谈话，问我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情况，我讲的与在杭州同毛主席谈的一样。因为其他方面我确实不知道。

会议始终是在小组里进行的，没有开大会，毛泽东也没有将到会的人召集在一起讲个话，见个面，合个影，更没有看见发会议简报。会中的情况都是由各组组长去向毛主席汇报的。

会议开始时，罗瑞卿正在广州、昆明军区视察部队工作，进行到第三天，通知他来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12月11日下午2时到达上海，没能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618号一个小院子里，一进小院实质上就被看管起来了。

罗瑞卿像绝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一样，事前根本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他来上海原先也以为可能是研究军事问题。也许因为是军人，带有职业病似的，领导上一通知开会，首先想到的就

是军事问题。

罗瑞卿一下飞机，看到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没有他熟悉的中央办公厅的一般工作人员，顿时心里产生了疑虑。因为按中央那时的规定：开会是不需要派负责人接送的。陈丕显在车内同罗瑞卿仅谈上海工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对开会的事，一字不吐。吴法宪一反常态，过去见到罗瑞卿时，开口“总长您好”闭口“祝首长健康”那种令人厌恶的献媚状态不见了，在车内还用他那眯眯眼不时地盯着他们。这使罗瑞卿感到有些茫然。

车飞快进城时，陈丕显告诉他这次不住锦江饭店，罗瑞卿觉得和以往来上海确实有点不同，心里只是沉默地想着，很少有兴趣说话。当车子快到目的地时，陈丕显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罗顿时感到很吃惊。他一下车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将罗的问题揭开了！

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7时左右，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罗瑞卿对于这个突然袭来的致命一击，精神上毫无准备，尽管他是个很坚强的具有高大身躯的男子汉，谈话后出来时怎么也没有力气登上二楼的卧室了。他被这当头一闷棍打蒙了！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

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

二是反对突出政治；

三是向党伸手。

罗瑞卿根本不承认，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后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

“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

“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罗瑞卿凄然地重复着这句话。

是啊！“关系不好！”那么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标准是什么？难道就凭这么一句可以做各种理解的中性语言，就能够将一个中央领导同志打下去吗？！

会议是15日结束的，那时只说罗瑞卿不在军队任职，专做政府工作。

16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说：“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毛主席说的这些话，当时没有在会议中传达。

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自然想不通。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他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能够把一切向毛主席解释清楚的。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

真了。”

谁都知道，毛泽东走到哪里，当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总是跟着保驾，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应该说毛主席对他了解的。既然“没有三条”，还要把问题挂起来，挂几百年到一万年，这是符合哪一家的法规呢？然而又确实出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真是令人不好理解。

六、我当代总长，德才资不够，难以胜任

在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中间，12月12日，中央军委开了一次会。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帅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

军委会上要我代理总参谋长。我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

刘少奇副主席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

我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少奇同志说：“命令以后再下。”

会后，我反复琢磨，还是觉得搞不了，确有难处，也怕给党造成损失，因此，在12月16日，我向周总理、邓总书记并报毛主席、刘副主席呈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

听了周总理12月12日在军委会上说，要我当代总长职务，心情一直紧张，反复考虑，我认为不适宜担任这一重要的工作。我德才资不够，政治思想水平低，有一点经验一般也是下层的一些经验，全军干部中比我德才资更好的很多，身体也不好，担心难以胜任。

21日，我将报告送给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并请他指示。叶副主席阅后，在上面写了如下批语：

成武同志：

信我看过了。我考虑：此件以缓发乃至不发为好。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请再加考虑。

叶剑英12月22日

遵照叶帅的批示，报告也就压下来了。上海会议结束后，我继续回杭州疗养。

七、讲到罗的问题时掉泪了

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总参谋部是由李天佑副总长和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回北京后，召集各部局领导同志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的。这个会的结束前夕，我由杭州回到北京，到会即席讲了几句话，当我想到过去和罗瑞卿一块工作的情景时，曾说罗很有能力，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是我的老首长，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就从那么高的位子上全撤下来，很是可惜！讲着讲着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掉泪了。后来这也成了打倒我的一条“罪状”。林彪骂我是“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在那个年代，同志间情谊友爱尽管很深，似乎一出了所谓政治问题就该忘却，稍有流露就可以扣上没有划清界限、立场没有转过来、是什么“分子”等等的政治帽子，压得你站不起来。

1966年3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揭批罗瑞卿的问题。

会议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为了开好这次会，军委决定设会务组，叶剑英兼组长，成员有萧华和我。

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幕那天邓小平主持并讲了话，罗瑞卿也天天出席。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声嘶力竭地当面诬陷“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致使罗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发生了3月18日的跳楼事件。

在这之前，罗瑞卿给夫人郝治平写了一份遗书：“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由于发生了“跳楼事件”，这就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时人们一般认为这种举动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因而激起到会一些人的发言升温。叶剑英副主席当时为此还填了一阕词，表示惋惜：

将军一跳身名裂，
向河梁，
回首望，
故人长绝。

八、“跳楼事件”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从3月18日后，决定会议背靠背地进行，到会的人都得表态、发言。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对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罗瑞卿的党籍，我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不能这样提，那是中央决定的事。

到了1968年3月24日所谓“杨余傅事件”时，温玉成说我包庇罗瑞卿，林彪据此在大会上说我“实际上袒护罗”，“本来就是一个罗瑞卿分子”。

会议结束后，由萧华去武汉向林彪汇报，而后林彪带着萧华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萧华留在杭州，出席了批彭真的会议。

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上报党中央。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文件里，中央明确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写了一大段批语：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

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党委。

1966年8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老河北厅召开会议，毛主席又向我们指示说：“罗瑞卿的问题，你们可以传达到全体干部。”从此，全军干部都知道罗瑞卿出事了，该要打倒了。

九、平反正名，“前度刘郎今又来”

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恢复了罗的名誉，回到领导岗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8月，中央召开党的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罗瑞卿、萧华和我，都是出席大会的代表，同住在京西宾馆，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当时的心情，正像唐朝诗人刘禹锡二次被贬连州14年后回到京城写的《再游玄都观》一诗说的：

百亩庭中半自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罗瑞卿一边吃饭，一边回顾过去，说：“对林彪的问题，我们3个人都瞎了眼，过去从没有反对过他，然而却都挨了整，但整得最惨的还是成武同志，他一家死了3口啊！我们两家（指萧华）还没有死人。”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

有人说：“是因为罗瑞卿干得很出色，太冒尖了。林彪怕别人超过他，位子坐不稳。”

毛泽东说：“罗瑞卿锋芒毕露，盛气凌人。”

聂荣臻元帅说：“一、三军团关系不好，罗瑞卿是决定的因素。”

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一次讲话中却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总而言之，在林彪手下，他要你做什么，你不依着他，跟他走，林彪就嫌你碍手，就用尽心机非把你搞掉不可！

□ 《炎黄春秋》2005.10（作者系总参管理局营房处原政委）

~~~~~

【本刊专稿】

## 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

• 余汝信 •

不久前出版的今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刊载了陈虹的《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一文。据陈虹说，该文是将其与杨成武关于文革前夕揭批罗瑞卿问题的谈话记录，“以第一人称

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1〕

说到要“留给历史”，可见陈虹将自己涂改史实的“责任”看得是多么的沉重！然而，杨成武在当年揭批罗瑞卿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档案、文献记录俱在，岂可以这么一篇文章就能饰掩过去？杨成武如确有自知之明，本可谈谈如何吸取党内无情斗争连绵不断、自己曾厕足其间也曾深受其害的深刻教训，以此警示后人。而不是象这篇谈话记录般，文过饰非，将自己装扮为旁观者，甚至有过人的先见之明，不是有不同意见，就是置身事外，一切责任都是别人的。

历史，岂能如此这般任人随意涂抹！

#### 一、1965：知情还是不知情？

在谈到1965年12月初关于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时，杨成武对陈虹说他事前毫不知情。杨说，他当时正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疗养（余注：总参的领导为什么要到空军的疗养院疗养？其实值得考究），接到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称毛要紧急召见的电话，心里直犯嘀咕：“什么事那么急？是东南沿海有什么军事行动？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武装侦察？我心里顿时产生种种疑问”。到上海“住进饭店后，见到几位老同志，他们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贺龙来上海时，带来了地图，可见他原以为讨论的也是军事问题。这和我来前的想法有共同之点”。〔2〕

这与杨成武自己在文革初期的说法大相径庭。据杨成武当年说，罗瑞卿的问题，他至少在1965年初就有察觉，而且，大量的材料表明，杨是上海会议最早的知情者之一。

杨成武当年说：“到了一九六五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罗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宫看了戏。我一回到家，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以为是有情况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后，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把陶铸造的谣也同我讲了。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说什么如果突出政治是对的话，那我罗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错误，犯了路线错误吗？大骂去127师检查工作的同志，骂的很难听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后后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五日，罗就要刘亚楼向叶群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

“这四条我们过去都讲过了。

“在五月份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上，又接连发生两件事。一是罗利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这次会议全体同志的机会，搞了一个大阴谋，带头并煽动各军区的同志向中央提出大量增加部队的定额。这个定额，提出最多要增加XXX万，逼林副主席表态。第二个是要合并军区，要把XX个军区，并成X个军区。第三个是要取消兵种，把兵种作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这些事情事先并没有报告、请示林副主席和军委常委，完全是向中央和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这是一件事。二是罗瑞卿要用个人名义在军委作战会议上作结论。林副主席知道以后非常严肃地说，作战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作结论，只有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结论。当天晚上，林副主席口述了一个指示，由他的秘书传给了军委作战会议搞秘书工作的李静同志和我，也传给了罗瑞卿，并要把他的指示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宣布。林副主席在这个时候，就想把罗瑞卿反党活动的盖子揭开。罗瑞卿紧张了，半夜跑到林副主席那里，假装检讨，保证再也不犯了。林副主席再一次给他悔改的机会，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传了，收回，看一看，将来他能改就好。林副主席还是想把他挽救过来”。

〔3〕

据杨成武以上所说，林彪1965年5月就想把罗瑞卿问题的盖子揭开，杨本人不仅是知情人，也是当事者之一，怎么到了年底真的要揭盖子时，他却反而毫不知情了？

就在林对罗表示极不满意的关头，1965年6月7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长提升为第一副总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14日，中央又再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对杨成武信任度的增加与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递减是成正比的，杨成武不可能不明白以上任命的内中深义。

1965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停职审查，杨成武兼代主任。这样，其时的杨成武身兼多职：军委副秘书长、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及总参办公厅）代主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副书记。都说罗瑞卿兼职多，杨的兼职也不少。

11月25日，叶群等向总参党委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了林办四人（叶群、罗孝礼、赵根生、李春生）两个多月来在江苏太仓沙溪公社参加四清的情况。信中说及“我们在参加运动的同时，也注意兼顾了照顾林彪同志身体的工作，最近他的身体又有些进步，这一切均请你们放心”，又说“叶群同志的抵抗力比过去显著增加，做群众工作每天要跑许多路，经常遇到刮风下雨，但从未感冒过。我们从实践中深深地感到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军队干部参加四清的的伟大决策是对我们的最大爱护和关怀”云云。（4）

值得注意的是，叶群报告的抬头是致“办公厅路扬副主任转办公厅党委常委、总参政治部叶运高主任并报总参党委、杨副总长、王副总长”。那时还是11月间，报告为什么不送罗瑞卿而仅送给杨成武、王新亭？杨成武难道不明白其中奥妙吗？

杨成武两天后即对叶群等人报告作出批示：

“王副总长、叶运高主任：

叶群等同志的来信及两份材料转去，请阅。我已看过，很好。他们到农村后，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显著，总结的经验也很好。建议将他们的来信和两份材料印发给总参党委委员、总参各部局党委，发总参参加社教工作的同志参考，并转报总政治部。如你们同意，请参政办。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5）

11月27日，离12月8日召开的上海会议至少还有十天时间，杨成武眼中已没有尚任总参党委书记、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而自行发号施令了。没有摸准上面的旨意，他杨成武敢吗？

据说，三天之后，即11月30日，叶群携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十一份材料，乘南空派出的里—2飞机秘密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6）

而据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回忆，当天是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的杨成武给张打了电话，约张到他那里去一趟。到杨处没说几句话，叶群就进来了。叶群声称要将一封林彪给毛的信面交毛，杨也说要见毛。回到毛处，张耀祠将上述情况向毛作了报告。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毛即通知张要见叶群，叫她快点来。（7）

在自己的著述中有意识地引述了张耀祠以上回忆的罗点点认为：“这些描写我认为是靠得住的”。（8）

以上张耀祠的回忆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叶群到毛处汇报罗问题之前，先到了杨处！联系到11月27日杨成武目中已无罗瑞卿的批示，杨成武晚年说他对批罗事前毫不知情，还说得通吗？

## 二、1966：仅仅是过头话吗？

关于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于1965年12月16日结束。12月29日，任命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

杨成武告诉陈虹说，上海会议期间军委曾开过一次会，会上要杨代理总长，杨推却，说最好由叶剑英兼任。并不是军委成员的刘少奇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杨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少奇同志说：‘命令以后再下’”。〔9〕

以上这些对话，今天已难以查证。惟可以查证到的是，王尚荣自此直至1966年“8·25事件”被杨成武以夺他的权名义被打倒，一直未有等到任其为副总参谋长的命令。〔10〕

杨成武又告诉陈虹：1966年3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揭批罗瑞卿的问题。由于吴法宪等的发言“致使罗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发生了3月18日的跳楼事件”。“中央从3月18日后，决定会议背靠背地进行，到会的人都得表态、发言。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对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罗瑞卿的党籍，我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不能这样提，那是中央决定的事”。〔11〕

众所周知，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的联合发言，是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传达的。作为附件同时下发传达的，还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的发言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12〕

杨成武将作为中央正式文件附件的这些发言、信件按下不提，却去大谈当年未有形成中央正式文件而今天我们又看不到、难于判别真伪的所谓温玉成、邱会作、吴法宪的发言，岂不是欲盖弥彰，故意把水搅浑吗？

说联名发言的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杨成武目的岂不是将责任全推到别人身上，自己清白？发言中涉及的高层斗争，杨成武不提供情况，作为总参二级部领导的王、雷是不可能知情的。即使发言的执笔人是王、雷，难道作为下级、执笔者的责任大于上级领导、策划人的责任？说“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我们以下引用发言中的某些段落，读者诸君自可鉴别。

联名发言声称，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撒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是一个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在很多问题上，他不是按党的原则办事，而是投机，看风使舵，凡是对他有利可图、有名可沾、有权可夺的事，他就抢着干，什么接见呀！照相呀！登报呀！抢版面呀！写文章呀！发表演说呀！大比武呀！工作归口呀！等等，他特别积极，特别感兴趣，但当某件事对他不利，或者没有油水可捞的时候，他就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别人只能受他驱使，为他抬轿子，决不能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说一个不字。他的人生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和唯我论者”。

再引用下去，还有：罗“是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颗‘定时炸弹’。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恨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

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资产阶级思想在他脑子里很深的。为了个人得权得势，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我们和他的斗争，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斗争，而是一场维护革命利益，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13〕

上述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性语言，哪有一丝一毫“留有余地”的味道？！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彭、罗、陆、杨”的问题。杨成武在这次会议的小组会上作了批判彭真的发言，发言共有三个部分，除第一部分指责了彭真“在晋察冀的错误”及第三部分指责彭真“极力插手军队工作”外，第二部分指责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14〕

所谓“恶劣表现”，杨成武在次年春天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总结为“四大阴谋”：“一是六条清规戒律”，“二是五个不准”，“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个追查”，具体内容，详见本文附件，不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成武1966年5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1967年3月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也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此际王尚荣、雷英夫早被打倒，杨成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了！所以，他对陈虹的谈话，根本就不提这两次重要发言。

### 三、1967：“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军委在北京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以提高军队高级干部对文革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萧华、杨成武在会议上分别作了讲话。林彪讲了三个问题：一、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问题；二、主流、支流问题；三、军队支援地方问题；周恩来、李富春分别讲了军管和抓革命、促生产问题；陈伯达、康生讲了文革中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即刘邓问题。而杨成武讲的，是“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以上各人的讲话，就数杨成武的调门最高，点名最多，自然，也不忘在讲话中大肆吹捧林彪。晋人陶渊明有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杨成武这篇批判罗瑞卿、彭真，又连带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奇文”，笔者将其主要部分转载于文后，以供读者鉴识。

本来，文革中类似的大批判形式讲话，如恒河沙数，似不足为奇。但类似讲话，多是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诸人所为，象杨成武般出自军队高级干部之口的，确是异数。

杨成武这般卖力的表现，自然得到欣赏。就在他讲话十天之后，3月30日，以毛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栗裕为中央军委常委，而在此前，他连军委委员也不是。〔15〕

事实上，杨成武不仅在军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批罗，还支持军内造反派“斗罗”。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简称“斗罗筹”）中心组一号成员、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学员方凡在文革后交待：“我们当时根本不想‘斗罗’，因为不少人都认为罗是‘死老虎’

了。4月21日，萧华、杨成武提示要我们抓大方向，什么是‘大方向’呢？杨成武说：地方上不是正在批斗彭真、陆定一吗？彭、罗、陆、杨中的‘罗’是我们部队的呀！我们说没有材料怎么办？萧华说：全军文革可以提供，于是我们才决定以‘斗罗’的名义联合起来。我们只开过一次‘斗罗大会’，材料、经费、会场是全军文革提供和安排的。报告是经周总理批准的。5月12日开会那天，罗瑞卿、刘志坚、苏振华、王尚荣等老同志是由北京卫戍区的战士带入会场的”。“‘斗罗筹’活动了两个月。其中，‘4？11游行’也是全军文革同意的，行走路线是北京卫戍区指定的”。“5？13事件”后，军内以“5？13”划线，“‘冲派’一蹶不振，萧华、杨成武的日子也不好过了，社会上流传着他们将要被打倒的传闻”，“空气越来越紧张，压力越来越大，萧华、杨成武也不接见我们了。‘斗罗筹’内也因人心惶惶而于6月28日散伙”。（16）

所谓“全军文革”，于1967年1月改组重建，萧华、杨成武都是管事的副组长。“5·13”之后，萧华被打倒，杨成武滑了过去。9月，杨成武更被指定为军委办事组组长。

这一年的11月间，杨成武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他在文革中的最后一篇批罗大文——《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该文声称：“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罗瑞卿，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恶，就是长期以来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恶毒诽谤毛主席，攻击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反对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妄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理人罗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17）

平心而论，“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应该不是杨成武的发明。但由于这篇颇具影响力的长文以他个人名义发表，这些提法又强烈地打上了杨成武个人的印记（虽然文革后杨极力否认这篇文章与他本人有关）。

不过，物极必反。我们这位炙手可热得有点儿忘乎所以的军委办事组组长，这回马屁可拍到马腿上了。12月17日，毛泽东针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提出严厉批评：“（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18）

三个月后，“杨余傅事件”发生，杨成武真的垮了下来。后来，官方的党史学家众口一词都说“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江青搞的，他们大多不是忘记了，就是对毛1967年12月17日的批示装作视而不见——那，才是杨成武问题的先兆啊！（2005年11月）

注释：

〔1〕〔2〕〔9〕〔1〕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2005年10月），页1—9。

〔3〕《杨成武同志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西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1967年12月5日），页56—67。

〔4〕〔5〕《叶群等同志向总参党委的报告》（总参谋部政治部印，1965年，北京）。叶群到太仓参加四清时，林彪正在苏州休息。



〔6〕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页538。

〔7〕〔8〕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页181—184。

〔1〕〔15〕总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

〔12〕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附件一、二、三、四、六，1966年5月16日发出。

〔13〕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8号附件四。

〔14〕《杨成武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7号附件四。

〔16〕方凡：《我的申诉》，《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附件二（方凡自存材料抄件）。

〔17〕全文见《红旗》杂志1967年第16期（1967年11月23日出版），页30—39。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455。

~~~~~

【当事者说】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侧记

• 曾庆祥 •

（1966年11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挟持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赴京告状，周恩来总理从头到尾亲自处理了这一事件。作者作为廖志高的秘书，亲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详细地回顾了这段历史。）

1966年8月，北京学生陆续南下来川串连，省内的造反组织也相继出现，四川局势开始动荡。到11月，全省特别是成都市越来越混乱，一再遭冲击的西南局和省市委几近瘫痪，领导干部被围攻批斗甚至被扣留不放。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向中央报告：“省委机关被学生进驻，其中办公厅已被全部占用”，“11月26日，廖志高、李大章、廖井丹等省市委负责人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学生抓走，至今未放回。”当时，廖志高被北京学生控制在陕西街省高教局机关，他们同刚成立不久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共谋策划，决定挟持廖志高到北京告状。

◇ 阻拦、抢占火车的“革命行动”

11月27日凌晨，“兵团”总部的一些人挟持廖志高到了成都火车北站，随行的工作人员除了我和警卫员刘寿祥外，还有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裘尧鉴。当时天还没亮，一些厂矿单位和街道的队伍，打着“兵团××分团”的旗帜，敲着锣鼓，从城里不断赶来，车站内外人头拥挤，秩序异常混乱。一列从成都开往北京的火车被阻拦抢占，车上已经挤满了人。廖志高被带上其中一节硬卧车厢，车站站长也被抓了来。他们逼廖志高给站长下命令立即发车去京，廖志高以地方党委无权干预铁路系统的工作为由婉言拒绝，站长也表示需请示铁道部才能决定。临近中午，站上的喇叭开始反复广播：“周总理指示，有问题就地解决，不要来京，更不能阻拦和抢占火车”。此时，有的“兵团”组织偃旗息鼓准备撤离，有的则进行干预阻止，人群中出现争吵甚至相互谩骂和抓扯的混乱情况。后来在北京周总理接见的一次会上，“兵团”总部一位负责人讲到当时出现混乱的原因时说：“开始是站长办公室的人答复我们，铁道部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说只要有车票就可以去京，不久又突然反复广播周总理不让去的指示。我们

当时认为这是成都铁路局和车站搞的鬼，蓄意制造矛盾和混乱，从而导致各个分团甚至‘兵团’总部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先撤回去再说；有的则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我们，坚决反对撤离。经过激烈争吵辩论，直到傍晚才最后决定仍然去京，不让坐火车就抓住廖志高徒步前往。当时还准备再抓上成都市委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冯焕武一道前往，后来没有找到”。

就在车站广播周总理指示后不久，一伙自称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医支队”的人，来车厢里对廖志高围攻谩骂一阵后，说他们坚决支持“兵团”上京告状，不得已才阻拦抢占火车，这是针对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采取的“革命行动”，由此带来的后果应由省市委负责。并且拿出他们事先拟好的《声明》，逼迫廖志高签字，否则他们将采取更大的“革命行动”，卧轨阻拦成都所有发往各地的火车。最后，廖志高被迫在《声明》上签了字。

当晚，“兵团”总部主要负责人李长友（第五冶金建筑公司驾驶员）来车厢上宣布徒步赴京告状的决定，并指派“兵团”总部成员林云钦（成都无缝钢管厂工人）带领徐尚林（成都电线厂）、侯在均（西南电力修造厂）两名青年工人，把廖志高挟持到车站附近的四川省手工业管理厅机关会议室暂住一宿，准备次日（28日）动身上路。此后，即由林云钦等三人监控廖志高一直到后来返回成都。在京期间，他们都参加了总理的几次接见。我们同这三个人相处近一个月，尽管他们都是造反派，又负有监控廖志高的任务，但除了平时对我们有所戒备外，从来没有对廖志高提出过任何无理要求，他们都是工人队伍中正派、直爽和比较通情达理的好同志。

28日从手管厅出发前曾出现过一个小插曲。两位机关食堂炊事员吵闹着要面见廖志高，他们是老工人，林云钦等人不便阻拦，见面后两位老炊事员对廖志高问寒问暖，态度十分亲切友好，临别时还将一大堆煮熟的鸡蛋硬往我和警卫员小刘的口袋里塞，边哭泣边嘱咐：“一定要注意廖书记的健康和安全”，情绪非常激动，小刘要给付钱他们坚决拒收，小刘也被感动得流下了泪，在一旁看管廖志高的徐尚林等两位小青年工人也不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1982年廖志高来川治病休养，才得知当年这两位“炊事员”实际上是手工业管理厅的老红军干部，其中一位叫杨宗清的还到金牛宾馆来看望廖志高，他回忆说：“当时到处都乱轰轰的，很多事情我们都看不惯、想不通，那天听说要拉你上北京，我们既焦急耽心，又爱莫能助，只好冒充炊事员来看看你，否则人家不会让我们进去，回想起来真是啼笑皆非。”这些是后话，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老干部忧国忧民和关心爱护同志的精神。

◇ 总理和廖志高通电话

28日上午，在林云钦等人的监控下，廖志高和我们分乘“兵团”弄来的两辆小车出发，沿途看到零零落落的步行队伍中还有一些老年人和个别儿童。进入新都县境，早已在公路旁等候的县委副书记罗世发（全国劳模）拦住我们说：“周总理要找廖书记通电话，请立即去县委同北京联系。”到县委后，罗世发安排林云钦等人在会议室等候，只带领廖志高和我到他的办公室，很快同总理通上了话。总理首先问廖志高：“你身体怎么样？能吃得消吗？”廖志高回答：“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回来后，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劳累一些，但身体还可以，请总理放心。”总理又问：“他们来京到底要告什么状？”廖志高说：“我也不清楚，从这一两天的接触看，大多是涉及一些厂矿单位领导人压制群众、转移‘黑’材料和工作、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总理说：“这些问题只有在本地本单位才能解决嘛！能不能劝阻他们就地解决，不要来京？”廖志高说：“下面劝阻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前一两个月，我们按照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对发生的几起集体进京上访的人进行劝阻，多数人还听招呼，仍有少数不听劝阻的到了北京，‘中央文革小组’既是接见又是慰问，有的人（实指陈伯达）还鼓动说：‘你们冲破走资派的重重障碍，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我代表中央文革对你们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和欢迎’，载有这些消息的传单和大字报不断传回来到处张贴，使我们常被动，而且使上访甚至抓干部上京告状之风越刮越大，连我们省委组织部长安法孝最近也被控制到北京去了。因此，目前要劝阻确实难度极

大。”总理沉默了一阵又问：“你身边还带有什么人？”廖志高回答：“除秘书、警卫员外，还有办公厅一位副处长。”最后，总理嘱咐：“你要注意保重身体；目前情况复杂，还要注意安全。”我当场只记下了廖志高的谈话，通完电话后，他当即给我复述了总理的讲话内容，还十分感慨地说：“总理还是像过去（廖志高过去曾较长时期在总理领导下工作）那样，考虑问题非常细致，关心干部也十分周到。”后来我们到了北京，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对廖志高谈到：“12月28日早上7时，总理通宵办公后刚刚准备休息，就得知你被拉上路的消息，当即交代我们设法尽快找到你，他要和你通话。10点钟找到你，向他报告时他早已在办公室等候了，实际上就没有怎么休息。”

中午在新都县委吃午饭，廖志高向林云钦提出：徒步去北京，路远而且越往北天气越冷，希望“兵团”说服老弱和儿童回去。林云钦对总理和廖志高通话时县委把他撇在一边，早已十分不满，就气冲冲地说：“没法动员，全都得去！大不了死他几十百把人！你们怕出事就派车送嘛！”饭后，廖志高给我交代：“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问题，请省委考虑派几辆大客车，配上医护人员，沿途把老弱病幼尽量劝阻回去”。我把他的意见以及同总理通话的情况，电话告诉了省委办公厅值班的同志。

◇ 总理来电，要求选派代表去京

28日下午抵达广汉，“兵团”步行的队伍也陆续抵达。省委办公厅按总理电话要廖志高保重身体、注意安全的精神，增派了省委门诊部医生任长方和保卫科长廖肖一赶来随同我们去京。当晚，县委收到经总理亲自审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兵团”的电报（全文详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8页），主要内容是：“欢迎你们派代表（小厂一人，大厂二至三人，总数请不要超过三百人）来北京商谈。……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利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来京人数确定后望告，以便通知铁道部配车，车费由所属厂矿解决。廖志高同志也同你们的代表一道来京。”廖志高立即要县委连夜大量翻印，同时找来“兵团”主要负责人李长友，希望他们按电报要求尽快商派代表，待电报印好后立即组织力量散发下去做好群众工作。李长友表示同意，电报也于当晚深夜印好并散发出去了。

29日早饭后，北京工业大学来川串连的两名学生郝小林（女）、冯培新急急忙忙来县委向廖志高反映：“我们为了实现同工农结合和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愿望，这次一直跟‘兵团’从成都出发，昨天深夜又自告奋勇到工人群众中去散发和宣讲总理的电报，却受到一些人的阻挠和围攻。他们说电报是西南局和省市委伪造的，是廖志高搞的鬼，并且鼓励群众继续北上。目前，‘兵团’领导人之间争吵不休，群众也出现了分裂……”话未讲完，又有自称是某街道分团的几十个人，冲进县委气势汹汹地围攻廖志高，说电报开头对“兵团”的称呼是“成都工人造反团”，少了“兵”字特别是没有“革命”两个字，显然是别有用心和伪造的。经廖志高耐心说服解释，他们始终不相信，提出要立即同总理办公室通电话核实。当找到童小鹏同志证实确给“兵团”发过这样的电报后，又进一步要童小鹏电报全文，经逐字核对无误后，仍然在电话上纠缠和质问童小鹏，为什么要取消“革命”二字，并在电话上破口大骂：“到北京后要找你们算账！”在场的北工大学生郝小林，出生于外交部干部家庭，对总理十分崇敬，目睹这一情况，愤慨地说：“真没想到工人阶级队伍这样复杂，竟然对总理的指示抱这种态度。”说到伤心之处，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当天深夜，李长友带上郝小林、冯培新急急忙忙来到县委，说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局面已难以控制。“兵团”决定林云钦带上廖志高尽快离开队伍，先设法乘火车去京，当面要求总理允许已经上路的工人全部去京，他们留在后面继续做工作。同时提出要郝小林和冯培新连夜赶回成都转乘飞机回京向总理详细汇报。廖志高听后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只好这样办。并要我立即电话通知省委办公厅接待两个学生并为他们购买机票，同时对我们乘火车去京一事向总理

汇报后尽快作出安排。

30日凌晨，林云钦和我们提前从广汉乘车赶到绵阳，中午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已安排，请于今晚十二点前赶到江油车站，乘由成都开往北京的特快，到时由列车长接待。当晚，绵阳地委派车将廖志高和随行五名工作人员，加上林云钦等三人，一行共九人送到江油，12月1日凌晨一时登上火车，12月2日深夜抵京，中央办公厅安排我们九人全部住中直招待所。刚到招待所就接到通知：总理准备立即接见。

◇ 阻拦、抢占火车是错误行动，来京只能派代表

我们稍事休息后赶到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已是12月3日凌晨。周总理因处理其它公务还没有来，趁等待的时机，我随廖志高就近去总理办公室看望童小鹏。抗战时期，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廖在地下党川东特委，都分别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较长一段时期，见面后很自然地谈起总理的近况。童小鹏说：“‘文革’以来，总理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国际国内、大事小事都得管，头绪多，矛盾大，经常通宵达旦工作，很难安安稳稳地睡上两三个小时。他要办公室几个秘书轮流值班休息，自己却一直顶着干，经常搞得精疲力竭，看到他这样毫不考虑自己地拼老命，大家既着急又担心，真令人心痛。28日那天早晨，他通宵办公后正准备休息，得到你被抓上路的消息，就一直坐在办公室等着同你通电话，根本没有休息。即使让他去睡他也睡不着，真拿他没办法！”廖志高听后心情十分沉痛地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这次又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实在感到内疚！”

我们回到会议室，先期回京已向总理汇报过“兵团”情况的郝小林和冯培新也在座。大约凌晨一时，总理来了，他刚一坐下就首先表明：“从11月27日知道你们在成都火车站的情况后，就一直关心和跟着你们，到广汉时发去的电报上称呼‘造反团’，没有‘革命’两个字，这只是个简称，没有轻视你们或其它的意思。”接着，他对在成都火车站发生的拦车、抢车行为提出批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同我们过去革剥削阶级的命是两回事。你们有权利批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但不能拦车、抢车，把交通运输搞断。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支持，但不是每一项具体行动，特别是错误行动也都要支持。拦车抢车、影响交通不仅不是革命行动，而且是错误行动。你们的组织名称是‘工人造反兵团’，这样乱干，还像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吗？像个‘兵团’这样的军事组织嘛？造反，也要看造什么反，造谁的反嘛！”接着又批评廖志高：“听说你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这不对嘛！你承认我们不能承认。”

林云钦在汇报中说，目前已经上路的人动员不回去，代表也难推选，他代表“兵团”要求总理允许他们全部来京。周总理坚持原则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同时又耐心说服：“中央的态度很坚决，就是不能同意全部都来，只能派代表，这一点我们决不松口。步行来京我们也不赞成，你们不怕苦的精神无可非议，但这会花很长时间，必然影响生产，这样的行动我们决不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不应当影响、破坏生产，还应当促进和发展生产嘛！你们是工人阶级，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最近中央刚刚把红卫兵串连暂时停下来，准备加强交通运输，抓紧在冬季抢运生产上急需的原、燃材料和物资，这是当前十分急迫的大事，你们也替中央想想，能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周总理苦苦婆心一再说服，但林云钦仍然固执坚持他的要求，而且态度急躁，语气也较生硬。这时周总理生气了，他说：“那好！林云钦同志，我们两个人换个位置，你来当总理。如果全国都像你们那样，把交通搞断，影响了生产，你怎么办！？你们一两千人的队伍都要步行来京，走三千多华里，而且越往后天气越冷，遇到这种情况，你说该怎么办！？”一阵沉默之后，他又批评廖志高：“听说你同意派汽车运工人？”“我在这里公开宣布：这是错误的！”这时，林云钦才没有再吭气。后来在第二次接见会上，林云钦主动向总理承认错误，诚恳地作了检讨，总理说：“有错误，认识了就好！”

回到招待所，我带着埋怨情绪给廖志高说：“下面干部的处境那样困难，签字、表态、派车都是迫不得已的事，今天还遭总理批评，特别是当着‘兵团’那些人的面来批评，我硬是想不通！”这时，廖志高给我讲述了一段他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一些在四川地下党工作过的同志被错误审查，为了弄清和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1943年春，中央把我从重庆调回延安。先让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审查，由于有的同志不了解地下工作，给我提出：‘重庆是国民党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特务横行，你在那里呆了六、七年之久，又是地下党的头头，为什么没有被捕过？’等无法回答和解释不清的问题，而且一直纠缠不让我过关。我想不通，去总理那里倾诉自己的委屈情绪和困难处境。不久，总理来到审查小组，首先向大家介绍白区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危险性和所处的复杂环境，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我的委屈情绪和态度，要我正确对待组织的审查，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要采取欢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事实的可以申辩，但不能同大家顶撞争吵；当然也不能什么都包揽下来，更不能投入所好，随便乱说，这不仅给自己同时也会给组织上带来更多的麻烦。总理对我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讲给大家听的，这以后就再没有人纠缠，我也很快顺利地过了关。”他接着又说：“总理今天对我的批评本来就是正确的，我丝毫没有感到委屈，特别是当着大家的面来批评，实际上也是讲给大家听的，是对我今后工作的支持，是对我们的困境解围。”事实证明，以后“兵团”的人来逼廖志高签字表态的情况，确实大为减少。现在回想起来，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关心爱护老干部，千方百计为他们解脱困境，确实是竭尽全力和费尽心机的。

12月4日凌晨一时，总理第二次接见我们和刚抵京的成都磷肥厂和人造纤维厂的五位代表。会议一开始，总理就拿出一份材料给大家听：截止当晚止，已经到了绵阳、梓潼、剑阁和广元各有多少人，抢登火车的多少人，说服回去了多少人，哪些厂已经选出了代表，以及遇到什么问题，都讲得非常详细具体。可以看出，总理对“兵团”步行北上队伍沿途和抵京的情况了若指掌。他到磷肥和人造纤维两个厂已分四批共计114人抵京时，他对这两个厂在座的五位代表严厉地说：“光你们两个厂就来了一百多人，有的还是拿着学生串连免费票，冒充学生抢上火车来的。你们都是工人阶级，我倒要请教请教，如果全国都这样搞，行不行！？这种搞法我不能同意，不是代表的人到了北京我也不接见。你们五位代表要给其余109人讲清楚，不能再乱来！”接着又对廖志高说：“听说学生免费票是你们的省长同意给的，省长不执行国务院的指示，慷国家之慨，这哪能行呢？”

◇ 问题只有回本地本单位才能解决

12月4日以后，又有几批工人陆续抵京，总理于6日凌晨一时，又一次接见我们和新到的工人代表。总理首先用重庆“二七”造反团等其它工人造反组织来京后闹事的事例告诫他们：“工人阶级组织中也有不受纪律约束的，可能还有个别搞破坏的人，对这样的人不能放纵，一放纵就会乱来。你们要各自管好自己的队伍，特别是来京以后，要加强管理教育和纪律约束。如果有闹事的，是哪个厂的就由哪个厂的代表负责。”接着，总理要他们谈谈这次来京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归纳起来，大都是反映本厂本单位领导压制群众，以党团藉威胁造反派，隐藏、转移整群众的“黑”材料，以及要求罢某些领导的官等具体问题。总理一直耐心听完汇报后说：“要解决你们提出的问题并不难嘛，但只有回去在本地本单位才能解决。”“不准以党团藉威胁群众，不准压制和打击报复，我们发的电报中已明确讲了嘛！”“隐藏、转移整群众的材料，如果知道具体地点就派人同主管领导去查；如果没有就给他们讲清楚，今后一旦查出要加倍处罚。”“这些都是容易解决但又必须回本单位才能解决的问题，罢某些领导的官就不是那样简单，首先要调查清楚问题并且研究如何处理，还有个组织审批程序，总要有一个过程这个问题也必须回本地本单位才能解决，哪能今天只听了你们汇报就解决了呢？”最后他对廖志高说：“趁‘兵团’的人还没到齐之前，你抽些时间先找来了的工厂谈谈，同他们认真接触，搞搞工人运动嘛！”“谈的时候，大家摆事实、讲道理，究竟还有些什么问题，回去后如何解决，可以先交换交换

意见。”这次会后，廖志高先后找了“兵团”联合指挥部、“兵团青白区支队”所属几个工厂的入座谈，按照总理关于回本地本单位解决的指示精神做了一些工作，再没有发生围攻和强迫廖志高签字的情况。

这次会上，总理还给廖志高交办了两年事：一是汇报中一位代表反映，来京途中接到成都的电话，西南局、省市委有人谋杀了一位解放军干部，是用绳子勒死的，要求总理严惩凶手。总理当场交代廖志高尽快查明情况向他汇报。回到招待所，我立即电话告省委办公厅值班同志尽快办理，接电话的同志当即回答：“此事已完全弄清，死者是成都军区所属崇庆步校的一位领导干部，该校学生起来造反，揭露了他工作、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受到批判和冲击想不通自缢而死。外界有的造反组织闻讯后去殡仪馆抢走尸体，硬说颈上的自缢痕迹是被人谋害勒死的证据，曾来省委哄闹过，后来又在市体育场开了追悼大会，控诉西南局、省市委迫害谋杀军队干部的‘滔天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和夸大渲染的事。”第二天，我向总理的秘书周家鼎电话报告，请他转报总理，他说：“我也通过军队系统查了，确系自杀身亡，已经报告了总理，请转告志高同志，此事就此了结，不用再管了。”二是另一位代表反映：最近发现“产业军”总部（设在红照壁省政协大礼堂院内）挖有一条大地道，里面存有大量枪枝弹药和棉被等物资，还有一些尸体，说明“产业军”开始对革命派动手了，要求总理过问此事。总理听后说：“如果真有武器当然不好，但你们要冷静，不要轻信谣言”，同时交代廖志高回去后同“兵团”、“产业军”双方代表共同到现场查清此事后向他汇报。12月18日我们回到成都后，李长友等人仍把廖志高控制在“兵团”总部（设在成都无缝管厂），不让出去。后经我多方联系，直到12月20日，才由当时尚未被造反派抓走的省委副书记杨万选到场主持，“兵团”、“产业军”各派三名代表，同时找来听说提供这一消息来源的420厂工人赵勤纲，一起到红照壁大院认真查看，除了一个旧防空洞（长10米、宽2米）内堆有一些杂物外，根本没有什么地道，更谈不上枪枝弹药和尸体了。当场由我草拟了调查报告，结论是：“未发现地道和任何武器，也未发现有地道痕迹及其他可疑之处”，经共同确认并签名后，由杨万选带回省委向总理作了报告，实际上又是一件无中生有、耸人听闻的事。对这两件具体事的处理，都体现了总理关于有问题必须由本地本单位解决的精神。

◇ “解放大西南”的口号是错误的，对西南局和省、市委要一分为二，不要说“产业军”是保皇派

“兵团”沿途不听劝阻的工人和他们选出的代表已大部到京，都集中住在由全国总工会负责的白石桥接待站。总理又于12月11日凌晨接见我们和后来的代表，他耐心听取他们的汇报，并在讲话和插话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教育。

总理一开始就说：“从你们要求来京的第一天起，就给你们和各级有关部门打过六次电话，发过四次电报，说明中央处理这件事的原则和态度是明确的，同时也是做给志高同志看的。”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总理针对有些人的偏激言论，在插话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你们提出要‘解放大西南’，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大西南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早就解放了的嘛！现在还提这样的口号，针对谁呢！？”“对西南局和省、市委，要一分为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靠各级地方党委来贯彻，都整垮了，谁来贯彻？”“罢西南局、省市的官，要报经中央批准；中央还要调查和讨论。如果罢你们组织成员的官，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至少也要民主讨论讨论吧！？哪能那么简单呢？”“不把李井泉拉下马死不瞑目，这样的话太绝对，最好不要讲。”“对干部要分析，不是人人都犯了错误；就是犯了错误也有轻有重，是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能一概不信任，都要打倒。”“对犯错误的干部，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干部犯错误不要紧，只要检讨了就好。”“你们把省委书记带到北京来就不妥当，全省其它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就听不到他的检查了嘛！”

汇报中有人反映：现在成都有另一个工人组织“产业军”，是西南局和省市委搞起来的，有几十万人，专同“兵团”作对，是典型的保皇派。总理说：“不要说他们是保皇派，可能思想保守一些，要团结争取他们。不管他二十万、三十万，你们团结争取不过来，说明你们还不算真正的革命派。大方向对了，少数可以变成多数，否则多数也会成为少数。”

有人谈到“兵团”领导人之一的“杨大胡子”（杨中书），拉帮结派，处处同主要领导人李长友对立，致使“兵团”内部不团结，濒于分裂。总理说：“工人阶级要讲团结嘛！他到了以后，如有可能我可以找他谈一次，李长友也来，要他们搞好团结。但这是‘兵团’内部的事，靠你们自己去解决，我的意见也不强加于你们。”

“兵团”陆续到京的工人全部到齐后，总理于12月13日上午来到白石桥接待站“兵团”工人驻地，他始终坚持只接见接国务院电报要求选出的全体代表。这是正式接见，也是最后一次接见，他的讲话内容与前几次大体相同，最后他强调：工人阶级要顾全大局，应当尽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回本地本单位解决。

◇ 总理单独约见廖志高

在京期间，总理还找廖志高单独谈了一次话。12月9日晚，中央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李伟信同志来中直招待所，当着“兵团”林云钦等人的面说：“中央领导同志找廖志高现在去开会”，从而摆脱了他们的监控，把廖志高以及我和警卫员小刘送到北京饭店安排住下后才说：“总理要我们找个好点的地方让志高同志好好休息一下，我们考虑这里既安静又安全，生活也可以改善”。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两天，11日才回到中直招待所。

就在北京饭店的第二天（12月10日）下午，李伟信来通知廖志高立刻去总理那里。廖志高回来后给我讲了总理找去谈话的内容：除了询问廖志高近来工作和身体状况外，还谈到“文化大革命”发展成现在的情况，他也没有想到，但是现在不能停下来，就像火车进行当中急刹车就会出轨，只能慢慢地收，估计明年内可以告一段落（前不久的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也曾听说过毛主席打算运动再搞半年或稍长一些），要廖志高面对现实，正确对待，坚持下去。总理还要廖志高转告当时已向中央请假外出治病的李井泉抓紧写出检查，否则越拖越被动；如果有病就“以口代笔”，自己口述由秘书整理。我当即电话告省委办公厅值班同志，要他们设法尽快找到李井泉后转告。以后，我听李井泉秘书黎本初讲，他们当时正在云南昆明，总理秘书周家鼎已将上述内容直接告诉了他们，不久到了上海，又得到省委办公厅请华东局办公厅转告的这一内容，李井泉抓紧搞好检查后，即由黎本初专程回川交西南局转报了中央。从总理这次对廖志高的安排和谈话以及给李井泉的口信，可以看出，无论从生活上和政治上，他对干部的关怀、爱护，都是无微不至的。

近40年过去了，回顾这段历史，“兵团”赶京告状，只不过是“文革”初期发生在四川的一件具体历史事件，但它并不是孤立的。从横的方面看，它折射出当时全国普遍出现的混乱情况。从纵的方面看，十年浩劫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已经初见端倪。把它整理出来，希望能对进一步了解研究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所裨益。

□ 原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本期编辑：
丁凯文（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 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